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简体修订稿)

内容提要：敦煌社邑类型很多，最常见的有里社、渠社、互助社、佛社等。按阶级组织的社邑尚未见。绝大多数社邑与寺院的关系只是思想上（信仰上）的联系。燃灯社、行像社为燃灯、行像活动付出的人力、财物，应属社众的文化消费范畴。寺院上层与部分僧俗吏民之间诚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而不是“社”，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硙、油梁与放贷活动，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立社文书中所见的“义聚”是社邑的同义语，不是公共积累。

关键词：敦煌社邑 人员构成 活动频率 文化消费 经济关系

有关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问题，前贤已作大量的研究^①，成绩卓著，社邑的面目也因之渐呈清晰。虽然如此，也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即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有关社邑部分与宁可、郝春文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②等资料，对敦煌社邑的活动，佛社与寺院的经济关系等做些粗略的量化分析，或有助于对其时社邑的认识。

一、社邑的类型与成员构成

敦煌社邑的类型很多，最常见的是里巷社、互助社、佛社、渠社。这里所说的“里巷社”乃泛指基层社区单位（如里、村、坊、巷等等）组织的官社。里巷社是根据官方意图，按地域组织，各户都要参加的社。这种社源远流长，主要活动是举办春秋社祭^③。作为官社的里巷社，除例行的社祭外，有时还负有协助官府劝课农桑，催驱赋役，维持社会治安之责。敦煌出土的《周长安三年（703）前后敦煌县牒》^④就谈到：承州符，对“耕耘最少”的某些乡的“社官、村正”各决二十；对“营功稍少”的敦煌、平康、龙勒、慈惠、神沙等乡的“社官、村正”各决十下；对洪池乡的“社官、村正”决五下。同出文书还有“悬泉乡，合当乡见社官、村正到”，“二月十六日，社官村正到”等记载，说明当时里巷社受州县司统辖，负有劝课农桑之责。吐蕃时期至大中年间的敦煌儒风坊西巷社的社条规定：“科税之艰、并须齐赴”，“所有科税，期集所敛物。不依限纳齐者，罚油壹升，用贮社”^⑤。表明其时里巷

^①（日）那波利贞：《唐代社邑に就きて》，《史林》第23卷第2、3、4号，1939；（日）那波利贞：《佛教信仰に基きて组织せられたる中晚唐五代時代の社邑に就きて》，《史林》第24卷第3、4号，1938；（法）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紀の寺院經濟》，《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9卷，1956，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有同名中译本；（日）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书の研究》，《东方学报》第35期，1964；郭锋：《敦煌的“社”及其活动》，《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1期；宁可：《述社邑》，《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郝春文：《敦煌私社的“义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郝春文：《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席”考》，《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郝春文：《敦煌的渠人与渠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杨森：《晚唐五代两件〈女人社〉文书札记》，《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等等。有关社邑的研究综述见诚逊：《五十年来（1938—1990）敦煌写本社文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8期。

^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附表简称《释录》；《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附表简称《辑校》。

^③《通典》卷121《开元礼纂类·诸里祭社稷》条下就谈到诸里（村、坊）祭社稷的礼仪。说明当时作为官社的里（村、坊）社的春秋祭社稷仍经常进行。

^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331页。

^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271页，《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5页。据竺沙雅章研究，此条款

社还有催驱赋役之责。后周显德五年（958）前后的高住儿等社欠柴人名目^①，也显示其时巷社还负有替官府催驱柴薪之责^②。显德五年二月社录事阴保山牒残卷^③显示，其时此类巷社还兼负维持治安之责^④。吐蕃时期与大中年间儒风坊西巷社社条显示：里巷社的社众，经过协商一致还可以订立丧葬互助与其它互助的社条，从而使里巷社兼有民间私社的某些功能，或者说兼有民间私社的性质。丁酉年（997？）五月乘安坊巷社社人吴怀实托兄王七承当社事凭据^⑤也显示：该巷社亦兼具民间私社的性质。因为里巷社常兼有私社的性质，故常被误认为单纯的民间私社^⑥。

渠社作为维修渠堰、分配用水的最基层组织，由各该渠堰用水僧俗吏民按渠堰组成^⑦。用水僧俗吏民参加渠社是一种与其用水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与行政性^⑧。唐前期，敦煌渠堰的维修由州县当局主持，“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廩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⑨。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行政系统虽发生重大变化，但地方当局主持维修渠堰与分配、监督用水的职能不变。所不同的是，从吐蕃时期起，利用渠社这一形式维修渠堰与分配用水。

和里巷社一样，渠社也可以通过内部协商而兼有丧葬互助与其它互助功能。渠社的这种功能是次要的，派生的。因为渠社的主要功能和组织原则与互助社判然有别，因此它不能归类于互助社。其时“渠人转帖”多用于集众修水利，有时也用于集众参加春座局席，“渠社转帖”则用于集众参加丧葬互助，此或习惯所然，但也显示，渠人组织的社邑，只有一部分兼有私社性质，而不是都兼有私社性质。

互助社与佛社都是僧俗吏民自愿结成的民间私社。互助社，时人或称为兄弟社、亲情社，以联络感情、互济互助为主要宗旨，有的还兼行一些佛事活动（主要是斋会之类活动）。佛社则以修窟、造像、燃灯、行像等为宗旨，有的还兼行丧葬互助等活动。本文附表<一>显示：互助社中，兼行佛事之社与不兼行佛事之社，数量大体相当而略少。在佛社中，兼行互助事项者，与不兼行互助事项者，也大体相当。论者或谓：“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唐后期

订于吐蕃时期，大中以后继续遵行。

①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446页。

② 《欠柴人名目》残卷前后俱缺，现存部分记载：“高住儿社八十二人，见纳六十五人，欠十七人”，存姓名者22人（主要是欠柴者与新近“柴足”者，下同）；“索留住巷一百六人，见纳六十人，欠四十六人”，存姓名完整者46人，另有3人姓名残缺不全；“程弘员巷八十九人，见纳六十四人，欠廿五人”，存姓名完整者14人，另有6人姓名残缺不全。《后周显德五年阴保山等牒》存45人，其中押衙索留住与令狐保住、令狐保升、石幸通、石富通、令狐富达、令狐富悦、令狐富盈、索友定、杨员子、王员住、安丑胡、张善才、张富通、令狐庆住、令狐富盈（另一令狐富盈）、王顺子等17人又见于《欠柴人名目》中之“索留住巷”。《后周显德五年阴保山等牒》中有一“陌美友”，《欠柴人名目》图版中此人比较模糊，《释录》录为“泊善友”，两人很可能是同一人。《欠柴人名目》“索留住巷”中有一“阴山子，病”，此人或即《后周显德五年阴保山等牒》中的“社录事阴保山”，但不能确定。值得注意的是，阴保山牒残卷中人绝不见于《欠柴人名目》中之与“索留住巷”相邻的“高住儿社”与“程弘员巷”，虽然“高住儿社”、“程弘员巷”留存下来的姓名完整者也达36人之多。“高住儿社”与“索留住巷”、“程弘员巷”在此件文书中并列，说明这里所说的“社”，也就是巷社。“索留住巷”欠柴46人中至少有17人见于显德五年社录事阴保山牒残卷，说明“索留住巷”亦即阴保山任社录事之巷社。

③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511页，《敦煌社邑文书辑校》43页。

④ 阴保山牒前缺，存45人。该牒实行“三人团保”，每人都要画押。

⑤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383页，《敦煌社邑文书辑校》746页。

⑥ 上引吐蕃时期至大中年间的敦煌儒风坊西巷社就常被当作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民间自愿组织的民间私社的典型。

⑦ 里巷社与渠社都是按地域组织的，所不同的是：里巷社是根据居民的居住地进行组织，而渠社则是根据用水田土所在地进行组织。因为居民的居住地与居民田土所在地常不一致，所以里巷社不可能代行渠社职责。在自耕场合，有义务参加渠社的是田主；在租佃场合，有义务参加渠社的仍是田主，但实际承担“渠河口作”义务的，则是佃人。

⑧ 渠人转帖常有“捉二人后到，罚决杖七下，全不来者，官中处分”等语，若是修桥、修闸，其事由亦常写明，系“官中处分”。凡此等等，皆表明渠社属官社范畴，不是民间私社。

⑨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水部式残卷》，《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577页。

五代宋初的以经济和生活互助活动为主要活动的写本社条中,大部分都对从事佛教活动有所规定”^①,其说似乎缺乏统计依据。

互助社和佛社的人员构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全由世俗吏民组成;一种是既有世俗吏民,又有僧尼;一种是全由僧尼组成。第一、三种情况都比较少见。第二种情况则很常见。

全由僧尼组成的社邑又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将当地整个佛教僧团组织为社。如某年陈僧正、录事为普光寺汩阇梨迁化而发的“时年转帖”^②所示:该社录事为陈僧正,社人也都是僧尼,而且是龙兴寺、乾元寺、永安寺(或永康寺)、金光明寺、灵图寺、显德寺、乾明寺、三界寺、净土寺、莲台寺、报恩寺、大云寺、灵修寺、圣光寺、安国寺、大乘寺等 17 个寺每个寺都有人参加,每个寺都是 2—3 人,可能是当代表^③。可见这个“社”包括了整个敦煌佛教僧团。一种是既非整个佛教僧团,但也不只是一个寺。某年某寺上座索贞为“常年春座局席”发出一份“社司转帖”^④,通知预会者也悉为僧人,其中提及 2 位上座(索贞与阎上座)、2 位寺主(张寺主与善净寺主法净),显然不只是一个寺,但也不至于包括整个佛教僧团。一种是只包括一个寺的僧尼。如某年为“慈光延设”而发的一份“社司转帖”^⑤,通知预会的仅慈恩、善恩、清愿、道济、道荣、坚愿、应深等 7 人,很可能同出于一寺。

僧尼参加互助社,多数可能是个人行为,亦即出于自身的需要自愿参加,其对社邑的权利,由其自身享受;其对社邑的义务,亦由其自身承担。但也有一些社邑,僧尼的入社很可能是作为寺院的代表,而不是(或者说不全是)个人行为。敦煌出土的某寺庚寅年(930)9月11日~辛卯年7月9日诸色斛斗支出簿^⑥就透露这一信息。该件残存 20 行,其中记录吊赠 17 项,包括“吊达家夫人大社粟壹斗,小社粟壹斗”、“孔库官社印沙佛粟壹斗”、“都官社吊孝粟壹斗”、“阎都衙社粟壹斗”、“索阿朵子赠粟壹斗”、“吊孝索家娘子粟三斗”等等。此类开支既由寺院支付,就不可能仅仅是个人行为。

其时敦煌的社邑有一部分是按行业、职业组织的,如P3899号文书(开元十五年沙州敦煌县勾征悬泉府马社钱案卷)^⑦提到的马社,S4252背(5)号文书(某某付什物历)^⑧提到的舆子社、邈舆社、邈生社,P4063号文书(官健转帖)^⑨提到的官健社,以及完全由僧尼组成的各种社邑,都属于按行业、职业组织的社^⑩。论者或认为其时敦煌已出现按阶级结社的现象¹¹。主要论据有二:1、从现存唐五代敦煌两件女人社文书的女人题名看,“这两个社都是由下层妇女组成”;2、上引庚寅年至辛卯年某寺诸色支出簿中“又有‘夫人大社、小社’等名称,这种‘夫人社’或者就是由沙州地方官吏的夫人们组成”¹²。笔者以为这些理由都是出于对资料的误解,碍难成立。说两件女人社“都是由下层妇女组成”,并无确据,因为我们无法确知参加此两个女人社者的社会经济地位¹³。既然无法确知参加此两个女人社者的

^① 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356页。

^③ 被通知参加该活动者多为“僧正”、“法律”,估计多为各寺之主事者。主事者与会,当有代表之意。

^④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345页,《敦煌社邑文书辑校》153页。

^⑤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322页,《敦煌社邑文书辑校》313页。

^⑥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205页,《敦煌社邑文书辑校》777页。

^⑦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432页,《敦煌社邑文书辑校》725页。

^⑧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51页。

^⑨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331页,《敦煌社邑文书辑校》182页。

^⑩ 幽州云居寺石经题记所见的唐五代“小彩行社”、“白米行造石经社”、“绢行社”、“生铁行社”等等,也都是按行业、职业组织的社,参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83~85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¹¹ 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¹² 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¹³ 那波利贞认为P3489号文书(戊辰年正月旌坊巷女人社社条)所见的女人社由婢女组成(见那波利贞:《唐代社邑に就きて》,《史林》第23卷第2、3、4号,1939)。杨森认为后一女人社由小妻、妾组成(见杨森:《晚唐五代两件(女人社)文书札记》,《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其说亦皆碍难成立。那波利贞认为P3489号文书所见的女人社由婢女组成,主要是因为他将“旌坊巷女人社社条”识读为“雇坊巷女人社”,从而认为该社“女人”都是受雇佣者。杨森认为后一女人社由小妻、妾组成,是因为该女人社社条中有这

社会经济地位，也就无法确知她们属于哪个阶级。至于“达家夫人社”之“达”字，乃是一种姓氏，而不是达家贵人之意。敦煌S4649号文书（庚午二月十日沿寺破历）载：“（二月）十六日，粟壹硕贰斗，沽酒看达家娘子垒园用”^①，P2629号文书（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载：“（八月）十六日，窟上酒壹瓮，达家垒舍酒壹瓮”，“（九月）廿四日，达家小娘子发色酒五升”，“（十月）十二日千渠送达家娘子酒壹瓮”^②，S2894(背)文书（十世纪的一份名籍）中也有一人姓“达”名“曲面”^③，凡此皆可证明所谓“达家夫人”即某达姓夫人。“达家夫人社”，即达姓夫人所在的社^④。我们不应将作为姓氏的“达”字与“夫人”割裂开，又将“夫人”与“社”字组合成一个专有名词——“夫人社”，进而推论当时有专由“官吏夫人组成”的社。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有专由“官吏夫人组成”的社，也不能证明当时就有按阶级的结社，道理很简单，“官吏”或“官吏的夫人”都不是阶级。

表一、敦煌立社文书所见的社邑类型与预定活动项目表

社邑类型与预定活动	社 邑 类 型						预 定 活 动 项 目											
	互 助 社		佛 社		巷 社		佛 事 活 动								非 佛 事 活 动			
	兼佛事活动	不兼佛事活动	兼互助活动	不兼互助活动	兼互助活动	不兼互助活动	修佛堂	修窟	燃灯	新年建福	印沙佛	造于兰盆	三斋	小计	丧葬互助	其它互助	二社	小计
件类与所见立社文书	4	6?	3	3	1		1	1	2	2	1	1	4	11	14	4	5	14
所占比例	23.5%	35.3%	17.6%	17.6%	5.9%		5.9%	5.9%	11.8%	11.8%	5.9%	5.9%	23.5%	64.7%	82.4%	23.5%	29.4%	82.4%
(备注见下页)																		

么一条：“社内荣凶逐吉……仰社众盖白（担）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谏（拣）厚薄、轻重，亦无重责”。认为该社条的其“主人”云云，表明入社者身份低微。其实，这里所谓的“主人”，不是主仆之“主”，而是主客之“主”。具体地讲，也就是指丧主家庭。意思是，如遇丧葬事宜，社众盖白担拽便送，不管主家招待厚薄，对丧主家庭“亦无重责”。“主人”此义，社司转帖中所在多见，应不难辨析。

①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215页。
 ②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275页。
 ③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333页。此件中的人名多见于壬申年（972）社司转帖。
 ④ 该件文书所见的“孔库官社”、“阎都衙社”、“都官社”等，亦当作如是观。该件文书所说的“大社”、“小社”，其确切含义还不清楚，或许与达氏两代人分别立户、分别入社、分别接受吊唁有关。

（接上页表一、）

以上统计包括实用的立社文书与样书等。样书、抄件有复件者仅收录 1 件，残损过甚者不录。

A: 甲辰年（944）五月窟头修佛堂社再请三官凭约	《释录》第 1 辑第 277 页，《辑校》16 页
B: 庚午年（970）正月比丘福惠等修窟立凭，	《释录》第 1 辑第 278 页，《辑校》29 页
C: 大中九年（855）九月社长王武等再立社条，	《释录》第 1 辑第 269 页，《辑校》1 页
D: 太平兴国七年（982）二月立社条，	《释录》第 1 辑第 279 页，《辑校》34 页
E: 大中年间（847~860）及其前后儒风坊西巷社社条，	《释录》第 1 辑第 270 页，《辑校》4 页
F: 景福三年（894）五月某社社条，	《释录》第 1 辑第 273 页，《辑校》9 页
G: 戊辰年（968?）正月旌坊巷女人社社条，	《释录》第 1 辑第 276 页，《辑校》27 页
H: 某甲等立社条（样书），	《释录》第 1 辑第 281 页，《辑校》42 页
I: 某乙等立社条（样书），	《释录》第 1 辑第 285 页，《辑校》36 页
J: 立社条（样书），	《释录》第 1 辑第 289 页，《辑校》46 页
K: 显德六年（959）正月女人社再立社条，	《释录》第 1 辑第 274 页，《辑校》23 页
L: 立社条（样书），	《释录》第 1 辑第 280 页，《辑校》49 页
M: 上祖社条（样书），	《释录》第 1 辑第 284 页，《辑校》55 页
N: 申年五月三奴子等为补充社条事牒，	《释录》第 1 辑第 299 页，《辑校》713 页
O: 十世纪上半叶某社补充社条，	《释录》第 1 辑第 288 页，《辑校》19 页
P: 公元 940 前后亲情社社条，	《辑校》12 页
Q: 丙申年（938）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	山本达郎、池田温等编《敦煌吐鲁番文献（补篇）》，东洋文库，2001。以下简称《补篇》

二、社司转帖所见敦煌社邑的主要活动

上节附表一，我们曾根据现存敦煌的立社条文书对社邑的预定活动项目作了统计，因为现存立社条文书件数少，有的还只是补充社条，而不是全部社条，有的社条也未必都付之实施，因而上述统计还不能反映当时社邑活动的实际情况。为了更确切了解当时社邑活动的实际情况，我们拟用社司转帖的资料对社邑各种活动的频度进行量化的比较分析。我们之所以选用社司转帖而不选用其它社邑文书，一是因为现存各种社邑文书中，社司转帖数量最大，以此进行量化的比较分析，应该比较准确；二是因为社司转帖本身就是社众从事社司实际活动的记录，在各种社邑文书中适用范围最广，最具可比性，其它社邑文书（如社文、斋文、社司状牒等等）就不具这一特点；三是因为社司转帖在通知社众参加社邑活动的同时，多数还具载应携物品，这对了解社众参加社邑活动的经济负担（我们下节将要讨论）也大有好处。

现存社司转帖中事由清楚的计有 173 件，见附表二：

表二、社司转帖所见社邑活动情况

序号	年 代	资 料 出 处	事 由 (活 动 日 期)	应 携 物 品
1	乾宁三年 (896)	《释录》313 页， 《辑校》71 页	李再兴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色物两疋，饼三十”
2	乾宁年间 (894 — 897)	《辑校》75 页	程平水妻亡， 丧葬互助	“人各色物一疋，饼廿 []柴一束，粟一斗”

序号	年代	资 料 出 处	事 由 (活 动 日 期)	应 携 物 品
3	不 详	《释录》325 页, 《辑校》130 页	索富定身亡, 丧葬互助	“仪酒壹瓮, 人各粟一斗, 土褐布色物壹疋, 柴一束”
4	丁 巳 (957)	《释录》330 页, 《辑校》89 页	裴富定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饼廿, 升油柴束”
5	壬 申 (972)	《释录》334 页, 《辑校》112 页	亲情社裴留奴壹女亡, 丧葬互助	“人各面壹斤, 油壹合, 粟壹斗, 柴一束”
6	壬 申 (972)	《释录》334 页, 《辑校》112 页	亲情社汜再昌妻亡, 丧葬互助	“人各面壹斤, 油壹合, 粟壹斗, 柴一束, 鲜净绫绢色物三丈”
7	壬 申 (972)	《释录》335 页, 《辑校》106 页	李达? 兄弟身亡 丧葬互助	[]油粟, 鲜净褐縹色物三丈,
8	十世纪中 叶	《释录》342 页, 《辑校》97 页	贺保新父亡 丧葬互助	人各鲜净褐縹色物三丈, 柴束饼油
9	不 详	《释录》344 页, 《辑校》67 页	社户王张六身亡 丧葬互助	“借布人各一疋, 领巾三条, 祭盘麦各三升半, 赠面各三升半”
10	不 详	《释录》348 页, 《辑校》131 页	张员住身故 丧葬互助	“吊酒壹瓮, 人各粟一斗”
11	戊 午 (958)	《释录》352 页, 《辑校》92 页	亲情社傅郎母亡 丧葬互助	“合有吊酒, 人各粟壹斗”
12	不 详	《释录》352 页, 《辑校》123 页	亲情社张昌进身亡 丧葬互助	“吊酒壹瓮, 人各粟壹斗, 褐布色物二丈”
13	乙 酉 (925?)	《释录》353 页, 《辑校》78 页	亲情社康郎悉妇身故 丧葬互助	“吊酒壹瓮, 人各粟一斗”
14	925 年 前 后	《释录》353 页, 《辑校》80 页	亲情社张员通妻亡 丧葬互助	“吊酒壹瓮, 人各粟一斗”
15	不 详	《释录》354 页, 《辑校》128 页	亲情社王郎身故 丧葬互助	“吊酒壹瓮, 人各粟壹斗”
16	丁 卯 (967)	《释录》354 页, 《辑校》102 页	亲情社张憨儿母亡 丧葬互助	“吊酒壹瓮, 人各粟壹斗”
17	戊 子 (988)	《释录》355 页	兄弟社安三阿父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粟壹斗, 祭盘准旧例”
18	戊 子 (988)	《释录》355 页, 《辑校》117 页	兄弟社安定阿姊师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粟一斗”
19	不 详	《释录》356 页	普光寺汜阁梨迁化 丧葬互助	“盖黄助送”
20	甲 辰 (944)	《释录》359 页, 《辑校》83 页	郭保员弟亡 丧葬互助	“人各鲜净色物三丈, 麦一斗, 粟一斗, 饼廿”
21	辛 酉 (961)	《释录》361 页, 《辑校》99 页	安丑定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麦一斗, 粟一斗, 饼廿, 褐布色勿(物)两疋”
22	戊 午 (958?)	《释录》401 页, 《辑校》94 页	温押牙阿嫂身故 丧葬互助	“合有吊酒, 人各粟一斗”

序号	年代	资 料 出 处	事 由 (活 动 日 期)	应 携 物 品
23	不 详	《释录》403 页, 《辑校》85 页	索押牙妻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粟一斗, 饼廿口, 柴一束, 绛绢色物二丈”
24	967 年 前后	《辑校》105 页	张吉昌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饼卅翻”
25	壬 申 (972)	《辑校》109 页	某人新妇身故 丧葬互助	“人各油一合, []鲜净褐 布色物一疋”
26	不 详	《辑校》121 页	某人母亡 丧葬互助	“吊酒壹瓮, 人各粟一斗”
27	不 详	《辑校》124 页	社人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鲜[]斗, 柴一束”
28	不 详	《辑校》127 页	社人身亡 丧葬互助	“合有吊酒, 人各[]”
29	癸 亥 (903?)	《辑校》76 页	亲情社张贤者阿婆身故 丧葬互助	“吊酒一瓮, 人各粟一斗”
30	不 详	《辑校》88 页	张康三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绛绢鲜净色物半疋, 粟一 斗, 饼廿”
31	戊 午 (958)	《释录》400 页, 《辑校》371 页	渠社孙灰子身故 丧葬互助	“吊酒一瓮, 人各粟一斗”
32	958 年前	《释录》401 页, 《辑校》369 页	渠社某人身故 丧葬互助	“[]吊酒, 人各粟一斗”
33	壬 午 (923?)	《释录》409 页, 《辑校》366 页	渠社尹阿朵兄身故 丧葬互助	“吊酒一瓮, 人各粟壹斗”
34	丙 戌	《辑校》115 页	亲情社刘员定妻身故 丧葬互助	“吊酒壹瓮, 人各粟一斗”
35	不 详	《补篇》70 页	李兆兆身亡 丧葬互助	件残, 存“色物两疋”
36	庚 子 (940?)	《补篇》72 页	何子升女身亡 丧葬互助	“各人粟一斗, 并三十, 布褐色 两疋”
37	丙 午 (946)	《补篇》78 页	亲情社石口住男亡 丧葬互助	件残, 存“人 各粟口口”
38	壬 寅 (942)	《补篇》96 页	刘宅官女身故 丧葬互助	“吊酒瓮, 人各粟一斗”
39	申 年	《补遗》(一) ^①	索庆庆身亡 丧葬互助	“各着面一斗, 粟一斗, 色物半 疋”
40	口巳年	《补遗》(一)	梁进通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饼贰拾, 柴壹束, 红绯色 细褐布贰丈伍尺”
41	丁 卯	《补遗》(一)	邓南山母亡 丧葬互助	“吊酒一瓮, 人各粟壹斗”
42	不 详	《补遗》(一)	程富住阿耶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鲜净色物三丈, 饼廿, 燔 柴壹束”
43	不 详	《补遗》(一)	阎羊丝身亡 丧葬互助	“人各麦壹斗, 粟壹斗, 面壹斤”
44	壬 戌 (902?)	《辑校》101 页	兄弟社南衙都头荣亲 婚事互助	“人各床薄毡褥盘碗酒等”

^① 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被遗》(一)、(二)、(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2000 年第 2 期、2001 年第 4 期。以下简称《补遗》。

序号	年代	资 料 出 处	事 由 (活 动 日 期)	应 携 物 品
45	不 详	《释录》356 页, 《辑校》348 页	兄弟社某人荣亲 婚事互助	“[]敷设踏床牙盘褥叠口 等”
46	958 年 前后	《释录》402 页, 《辑校》374 页	渠人孙仓仓垒舍 互助	“人各粟一斗, 锹镢壹事”
47	申 年	《释录》298 页, 《辑校》310 页	武光晖起病 脚 互助	“人各粟二斗”
48	甲 戌?	《释录》324 页, 《辑校》224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麦一斗, 粟一斗, 面斗, 油半升”
49	己 卯 (859?)	《释录》325 页, 《辑校》135 页	年支春座局席 (2 月 10 日帖)	未 载
50	不 详	《补篇》76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油半升, 面壹斤”
51	不 详	《补篇》78 页	年支春座局席	未 载
52	丁 酉 (937)	《释录》329 页, 《辑校》148 页	“春秋局席”(正月 20 日)	“人各油面斤麦粟”
53	乙 卯	《释录》330 页, 《辑校》177 页	年支春座筵局(4 月 19 日)	“人各麦粟面准条”
54	丙 寅 (966)	《释录》331 页, 《辑校》182 页	官健社常年春座局 (4 月 17 日)	“人各粟壹斗”
55	乙 亥 (975?)	《释录》336 页, 《辑校》184 页	年支春座局席 (正月 10 日?)	“人各面一斤, 油一合, 粟一斗”
56	戊 子 (988)	《释录》337 页, 《辑校》194 页	年支春座局席 (闰五月 17 日)	“人各粟壹斗, 面一斤, 油半升”
57	丁 亥	《释录》339 页, 《辑校》189 页	“年春座局席” (正月 12 日)	“人各粟壹斗, 面壹斤, 油一合”
58	丁 亥?	《释录》339 页, 《辑校》230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面壹斤, 粟壹斗, 油壹合”
59	十世纪 20 年代?	《释录》345 页, 《辑校》153 页	年支春座局席 (4 月 14 日)	“人各面壹斤半, 油一合, 净粟 伍升”
60	不 详	《释录》346 页, 《辑校》218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面壹斤, 粟壹斗, 油半升”
61	不 详	《释录》347 页, 《辑校》232 页	常年春座局席	“人各粟壹斗, 油半升”
62	九世纪后 半	《释录》348 页, 《辑校》144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麦壹斗, 粟壹斗, 面贰斤, 油半升”
63	不 详	《释录》349 页, 《辑校》215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面口斤, 油半升, 粟壹斗”
64	不 详	《释录》361 页, 《辑校》175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粟一斗, 油半升, 面一斤”
65	甲 申 (986)	《释录》408 页, 《辑校》386 页	渠人常年春座局席 (4 月 13 日)	“人各粟一斗, 面肆升,”

序号	年代	资 料 出 处	事 由 (活 动 日 期)	应 携 物 品
66	不 详	《释录》410 页, 《辑校》220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麦壹斗, 粟壹斗, 面贰斤, 油半升”
67	943 年 前后	《释录》316 页, 《辑校》167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麦壹斗, 粟一斗”
68	十世纪上 半叶	《释录》310 页, 《辑校》168 页	“年支秋座局席”(2 月 26 日聚会, 实为春座)	未 载
69	大顺三年 (892)	《辑校》139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麦[]”
70	920 前后	《辑校》155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面壹斤, 油壹合, 粟壹斗”
71	936 前后	《辑校》158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面二斤, 油半升, 粟一斗”
72	不 详	《辑校》186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件 残 不 详
73	戊 子 (988)	《辑校》191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粟壹斗, 面壹斤”
74	不 详	《辑校》203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粟一斗, []”
75	不 详	《辑校》206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粟一斗, 面一斤, 油一合”
76	不 详	《辑校》211 页	年支春座局席 (正月 29 日)	“人各面壹贰斤, 麦壹斗, 粟壹 斗, 油半升”
77	不 详	《辑校》221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粟壹斗, 麦壹斗, 面壹斤, 油半升”
78	不 详	《辑校》227 页	年支春座局席	“[],油半胜, 粟一斗”
79	不 详	《辑校》229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麦斗, 粟壹斗, 面贰斤, 油半升”
80	不 详	《辑校》233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粟一斗, 面二斤, 油一合”
81	不 详	《辑校》235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油半斤, 面壹斗”
82	不 详	《辑校》235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粟一斗”
83	不 详	《辑校》237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人各送麦一斗, 粟一斗, 面二 斤, 油一合”
84	不 详	《辑校》238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件 残 不 详
85	不 详	《释录》339 页, 《辑校》240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件 残 不 详
86	不 详	《辑校》240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件 残 不 详
87	不 详	《辑校》241 页	年支春座局席	件 残 不 详
88	943 年 前后	《释录》317 页, 《辑校》160 页	年支秋座局席	“人各面贰斤, 油一合, 粟壹斗”
89	乙 亥 (855?)	《释录》319 页, 《辑校》132 页	秋座局席 (9 月 17 日)	未 载
90	不 详	《释录》320 页, 《辑校》198 页	年支秋座筵席 (11 月 6 日)	未 载
91	895 年	《辑校》142 页	年支秋座局席	未 载
92	九世纪末	《辑校》146 页	常年秋座局席	未 载
93	936 年前后	《辑校》156 页	年支秋座局席	“人各粟壹斗, 面贰斤, 油半升”

序号	年代	资 料 出 处	事 由 (活 动 日 期)	应 携 物 品
94	戊 午	《辑校》179 页	年支秋座局席 (9 月 12 日)	“人各麦壹[]”
95	癸 未	《辑校》187 页	年支秋座局席	“人各麦一斗，粟壹斗，面二斤，油半升”
96	十世纪	《辑校》201 页	年支秋座筵设 (11 月 8 日)	未 载
97	不 详	《辑校》213 页	年支秋座局席	“人各面贰斤，油半升，粟一斗”
98	不 详	《辑校》223 页	年支秋座局席	“[]斤，粟一斗，麦 []”
99	不 详	《辑校》225 页	年支秋座局席	“人各粟一斗，面壹斤，油半升”
100	不 详	《辑校》238 页	年支秋座局席	“麦一，粟一，油半升，面贰斤，”
101	不 详	《释录》295 页	年支秋座局席	件残，存“口斤，粟一斗，麦口口”
102	不 详	《补遗》(一)	年支秋座局席	未 载
103	不 详	《补遗》(二)	年支秋座局席	未 载
104	十世纪前半	《释录》309 页， 《辑校》173 页	常年局席	未 载
105	乙 巳	《辑校》162 页	常年局席 (12 月 13 日帖)	“人各麦一斗，粟一斗”
106	光启二年 (886)	《辑校》137 页	年支座社局席	未 载
107	943 年?	《辑校》159 页	常年座社局席	“人各麦壹斗，粟壹斗，面[]”
108	不 详	《释录》340 页， 《辑校》216 页	年支座社局席	“人各粟壹斗，面斤半，油半胜”
109	壬 辰 (992)	《释录》322 页， 《辑校》313 页	“局席造出”(4 月 24 日)	未 载
110	不 详	《释录》351 页， 《辑校》204 页	“二月坐社”	“人各助麦一斗五升，粟二斗”
111	己 丑	《辑校》196 页	“巷社一周”“结案局席”	“羊价麦[]”
112	894 年?	《辑校》141 页	年支[]局席	未 载
113	947 年前 后	《释录》341 页， 《辑校》164 页	社人李住儿筵席 (3 月 13 日)	“人各麦壹斗，粟壹斗”
114	不 详	《释录》341 页，	“[]席”	“人各面一斤，粟一斗，[]”
115	不 详	《释录》346 页， 《辑校》314 页	“张都头先罚局席造出”	未 载
116	十世纪初	《辑校》311 页	(僧)慈光筵设	“空酒壹斗”
117	戊 寅 (978)	《释录》440 页， 《辑校》378 页	渠人为水次浇粟事	未见记载
118	甲 申 (984)	《释录》404 页， 《辑校》382 页	渠人为水次逼近事	锹、白刺、枝、槲
119	甲 申 (984)	《释录》404 页， 《辑校》384 页	渠人为水次逼近事	锹、白刺、壁木
120	甲 申 (984)	《释录》405 页， 《辑校》394 页	渠人为水次逼近事	怪、白刺、槲

序号	年代	资 料 出 处	事 由 (活 动 日 期)	应 携 物 品
121	甲 申 (984)	《释录》405 页, 《辑校》388 页	渠人为水次逼近事	锹、白刺
122	不 详	《释录》407 页, 《辑校》396 页	渠人为水次[]	锹、白刺等
123	壬 午	《释录》408 页, 《辑校》380 页	渠人为水次逼近事	锹、白刺、桤、槲
124	不 详	《释录》409 页, 《辑校》399 页	渠人为水次逼近事	锹、白刺、枝、槲
125	十 世 纪 上 半	《辑校》367 页	渠人为水次逼近事	锹、白刺、枝、槲
126	甲 戌	《辑校》376 页	渠人修渠?	锹、桤、白刺、枝等
127	十 世 纪 后 半	《辑校》398 页	渠人为“官中处分”修闸	锹、桤、枝、槲等
128	甲 申 (984)	《释录》407 页, 《辑校》392 页	渠人为“官中处分田新 桥”	锹、桤、枝
129	不 详	《补篇》79 页	“平道及盖都乡桥”	锹、桤
130	不 详	《补篇》79 页	“官中处分”	锹、枝等
131	大中十二 年(858)	《释录》306 页, 《辑校》284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32	920?	《释录》323 页, 《辑校》289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33	壬 午 (922)	《释录》326 页, 《辑校》291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34	924?	《释录》326 页, 《辑校》295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35	庚 辰 (980)	《释录》336 页, 《辑校》298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36	丁 亥 (987)	《释录》338 页, 《辑校》300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37	九 世 纪 后 半	《释录》340 页, 《辑校》287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38	不 详	《释录》347 页, 《辑校》304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39	不 详	《释录》348 页, 《辑校》306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40	咸通十年 (869)	《辑校》285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41	甲 申 (924)	《辑校》293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42	940 年前后	《辑校》296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43	十世纪上半	《辑校》297 页	“要种商量”	未见记载

序号	年代	资 料 出 处	事 由 (活 动 日 期)	应 携 物 品
144	不 详	《辑校》302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45	不 详	《辑校》305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46	不 详	《辑校》306 页	少事商量	未见记载
147	庚 寅 (930?)	《释录》327 页, 《辑校》249 页	“准例建福一日”(正月 4 日)	“人各炉饼一双, 粟一斗”
148	壬 申 (972)	《释录》332 页, 《辑校》262 页	常年建福一日(12 月 23 日)	“人各炉饼一双, 粟一斗”
149	壬 申 (972)	《释录》332 页, 《辑校》260 页	常年建福一日(12 月 22 日)	“人各炉饼一双, 净粟一斗”
150	壬 申 (972)	《释录》332 页, 《辑校》269 页	常年建福一日(12 月 31 日)	“人各炉饼壹双, 净粟壹斗”
151	壬 申 (972)	《释录》334 页, 《辑校》267 页	常年建福一日(12 月 29 日)	“人各炉饼壹双, 粟壹斗”
152	壬 申 (972)	《释录》335 页, 《辑校》265 页	常年建福一日(12 月 24 日?)	“人各粟壹斗, 炉饼壹双, 雕箭壹具, 画被弓壹张”
153	911 前后	《释录》324 页, 《辑校》248 页	“建福一日”	“人各卢(炉)饼一双, 粟一斗”
154	不 详	《辑校》273 页	“(年)支见(建)一日”	“人各录(炉)饼一双”
155	十世纪上半?	《释录》360 页, 《辑校》254 页	建福	件残, 提及香花、佛食等
156	九世纪下半	《释录》315 页, 《辑校》246 页	“常年设斋”(正月 27 日)	“人各麦一斗”
157	十世纪中叶	《释录》312 页, 《辑校》256 页	“年支社斋”	“人各麦壹斗, 粟壹斗, 油半升, 面壹斤”
158	不 详	《释录》350 页, 《辑校》276 页	“常年设供”	“人各助麦一斗”
159	不 详	《辑校》279 页	“常年设斋一日”	件残不详
160	不 详	《释录》349 页 《辑校》275 页	“正月设斋一供”(正月九日帖)	件残, 提及油、豆等
161	十世纪后半	《辑校》271 页	“年支正月斋”(正月 17 日)	“人各面一升”
162	不 详	《补遗》(二)	“五月斋”	“助麦一斗”
163	不 详	《释录》304 页, 《辑校》243 页	“五日(月)斋” (4 月 1 日帖)	“人各助麦一斗”
164	不 详	《辑校》280 页	“年知(支)九月设斋”	“人各面二斤[]”
165	乙 巳 (945)	《补篇》72 页	“年支设斋”(九月)	未 载
166	吐蕃时期	《辑校》244 页	某人“设供”	未见记载
167	不 详	《辑校》280 页	某人“设”	未见记载
168	辛 未	《辑校》258 页	“社人拽佛”(2 月 7 日)	(其中三人应带马)

序号	年代	资 料 出 处	事 由 (活 动 日 期)	应 携 物 品
	(971)			
169	890 前后	《辑校》323 页	“常年印（沙佛？）	未见记载
170	庚 戌 (950)	《释录》360 页 《辑校》251 页	“佛堂头垒园墙”	锹、镢等
171	不 详	《释录》347 页 《辑校》278 页	“年支正月燃灯” (正月 21 日)	“人各油半升”
172	甲 申 (984)	《释录》406 页 《辑校》390 页	渠人转帖为“遂羊价”事	“人各麦二斗一升”
173	不 详	《释录》305 页 《辑校》307 页	限期纳物 (11 月 21 日帖)	未见记载

表三、社司转帖事由分类统

项目	局 席 与 互 助										佛 事								修 治 水 渠 等	少 事 商 量	其 他	总 计			
	局 席						互 助				小 计	建福、三斋等					燃 灯	印 沙 佛					其 他	小 计	
	春 座	秋 座	常 年 局 席	坐 社	其 他	小 计	丧 葬	荣 亲	其 他	小 计		建 福	常 年 建 福	正 月 斋	五 月 斋	九 月 斋									小 计
	件数	40	16	2	5	6	69	43	2	2		47	116	9	4	2									2
所占比例	23.1%	9.2%	1.2%	2.9%	3.5%	39.9%	24.9%	1.2%	1.2%	27.2%	67.1%	5.2%	2.3%	1.2%	1.2%	1.2%	0.6%	0.6%	2.3%	14.5%	8.1%	9.2%	1.2%	100%	

从附表二、三得见，时敦煌社邑的实际活动以春秋二社最为频繁，其次是丧葬互助。佛事活动的项目甚多，但活动频率不高，仅及丧葬互助频率或春秋二社频率的 45% 上下。这说明时人很讲究实际，对现世的诉求远较来世迫切。春秋二社是传统社邑的传统活动，除社祭外，还有联络社会感情的作用。春秋二社与丧葬互助的活动频率特高，说明时人既重视经济上、生活上的互助，也重视思想感情上的互助。渠社转帖相对较少，或与渠社出现较晚，存续时间较短有关。

对比附表一与附表二、三，我们发现社邑的实际活动与立社规定不尽相同，有的还相差甚远。如春秋二社局席，立社文书或二者都不提，或二者并提，绝未见单提春社局席的。如果社条关于春秋二社的规定都被认真执行，那么，春秋二社的活动频率应该大体相等。与此相关连，有关春社活动的转帖的数量亦应与秋社转帖大体相当。但实际上，有关秋座局席的转帖仅及春社的 40%。这说明，社条有关春社活动的规定大体上都被执行（尽管时间上常被推迟，有时甚至推迟到四、五月间），而有关秋座局席的规定则多数未被执行。

再如三斋活动，附表一所统计的立社文书中，提及三斋（一月、五月、九月共三次）的有 4 件，提及新年建福的有 2 件，而提及春秋二社的仅 5 件。依此推算，三斋、建福活动的频率应高于春秋二社（大体上应为 14: 10），然据附表三，三斋、建福的实际活动频率仅及春秋二社的 1 / 3。就三斋与建福而言，据立社文书推算，三斋的活动频率应为建福的 6 倍，

但实际上，建福活动的频率却倍多于三斋活动的总和^①。

再如经济上、生活上的互助，立社文书提及荣亲、脚或立庄造舍要众共成者有4件，占立社文书总数的24%，其比例与春秋二社、三斋大体相当。但实际上有关荣亲与其它互助的社司转帖却很少见，分别仅及社司转帖总数的1.2%。这说明立社文书中有关“立庄修舍，要众共成”，“男女婚姻，人事少多，亦乃莫绝”之类规定只是一种提倡，带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在实际生活中，却很少以社的名义进行此类活动^②。

下面再从社众这一角度，对其可能参加社司活动的频度及其负担进行粗略测算。参加春社局席活动，平均每人每次约交麦粟1.5斗。秋社与其它各种局席的活动频率约为春座局席的73%，则平均每个社众为此活动约开支麦粟1.1斗。丧葬互助加上其它互助，活动频率与春社活动相比大体上为1.2:1。约计之，一年一度此项活动约耗粮3斗（酒一瓮耗粮2斗，饼20折粮1斗）^③，包括三斋、建福活动在内的佛事活动的频率仅及春社活动的2/3。且亦以每人都一年一度参加此类活动，平均每次活动约耗粮2.5斗计之。若此，这三类活动都参加的社众，每人每年约耗粮8斗上下，加上油柴等等，折算起来，每人每年为此耗费一般为一石上下。参加活动项目少的社众，负担就更轻一些。因为社邑活动的负担大体上都不超过一般农户的承受能力，所以时人参加社邑活动十分踊跃^④。

这里再谈社邑文书所见的“月直”。论者或以为“月直”的主要工作是置办局席，并进而推论：“在敦煌，每月办一次局席的社并不是个别现象”^⑤。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敦煌社邑文书中，“月直”凡6见：第1例，大中年间儒风坊西巷社社条（附表一E件）：“所遭事一遍了者，便须承月直”。此例出自里巷社的社条，该社条很完整，其中并无每月轮办局席之说。因该官社有催驱赋役等责，该社之“月直”或即为此而设。第2例，某年十一月再限纳物转帖（附表二第154号），规定社众“并须月直纳物”，“如月直不存勾当，局席不如法及不办，重科”，转帖末尾还指定3人“差副月直，屈到被（彼）处，如违，罚”；第3例，寅年十一月社司令狐建充使违例牒^⑥，提及：“往日已前所差者并当日营造，今被推延，故违众烈（列）”。这两例属于同一社司的转帖，其“月直”之责就是当差跑腿（包括经办局席），收纳财物。第4例，丙戌年九月十九日亲情社刘员定妻身死转帖（附表二第35号），社众董郎姓名旁注“月直”；第5例，壬申年六月四日李达史弟身亡转帖（附表二第7号），社众阴海定姓名旁注“月直”；第6例，某年七月三日亲情社张昌进身亡转帖（附表二第12号），社众左郎姓名旁注“月直”。此三例皆出自丧葬互助转帖，其“月直”之责不外乎丧葬时统一收纳转交社众赠物，事后统一归还借物等，与置办局席亦了不相涉。

三、关于“三驮”与所谓“义聚”

“三驮”（“三赠”）是丧葬互助中的一项特殊规定。立“三驮”名目标程序，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一文论之已详，这里只谈立三驮的性质。我们知道，社邑内部实行丧葬互助的基本原则就是互助。既是互助，社众间的权利与义务就应大体平衡。因为社

^①这说明，立社文书中虽常有“春秋二社旧规，建福、三斋本分”之说，实际上多数社邑并未举办正月斋、五月斋、九月斋。时人重视春座局席与新年建福，其意或在借辞旧迎新之际以联络社众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贺岁活动。

^② 社众之间，以个人或家庭名义进行荣亲与其它互助者，应更常见。

^③ 丧葬互助场合，一般仅规定纳吊酒与麦粟面等，有的还规定要借“色物”数丈或数疋。此类色物用后要还，说见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文。此外，有的还有吊布数尺，但吊布一般出于自愿，社司对此多数未作统一规定。

^④ 现存敦煌社邑文书中，投社状计7件，退社状仅1件，说明时人投社很踊跃，退社则很罕见。

^⑤ 郝春文：《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局席”考》

^⑥ 《敦煌社邑文书辑校》716页。

众的家庭规模大小不一，如果社人的每位家属都有获赠权利，那么，单身或一夫一妻家庭与上有数老、下有众小家庭，在权利、义务方面就难以相对平衡。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实行丧葬互助的社邑对吊赠对象的范围加以限制，有的仅限于社众本身（如附表一D件）；有的限于社人本身及其妻、父母（如附表一I件）；有的限于社人家内3人（如附表一C、E、L、M、O等件）；有的限于“社内十岁以上”3人（如附表一P件）。这后两种情况即所谓“三驮”或“三赠”。实行“三驮”办法的社邑，约占实行丧葬互助社邑的半数。“上三驮”、“三赠”又有两种：一种是事先“举名请赠”，一种是不预先举名，家内有三人受赠毕，就重新置筵席（或再上驮），重新开始。实行“三驮”、“三赠”办法的社邑，社人本身亡故，无论立三驮与否，赠物与赠仪都一样：赠物准赠例，都要送葬。立三驮名目的社人家属亡故，赠物或同于社人本身亡故例，或略少；仪礼方面，或送葬或不送葬。未立三驮名目的社人家属亡故，则没有获赠权利。从本质上讲，实行“三驮”办法的丧葬互助，仍属互助性质，谈不上是“入社的富户、官僚、军将对贫苦社人的一种变相的剥削”^①。

再谈“义聚”问题。上引儒风坊西巷社的第一条开头就是“所置义聚，备凝凶祸，相共助诚（成），益期 济急难”。论者以为此“义聚”指的是“私社的公工积累”^②。笔者以为所谓“义聚”就是以义相聚之意，不能附会为公共积累。《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载：“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宋史》卷四五六《孝友传》载樊景温兄弟，荣恕 兄弟都曾“兄弟异居积年”，后来“复义聚，乡人称雍睦”，皆可见已成家的兄弟同居共财，即可称为“义聚”。宗族同居共财，更可称为“义聚”^③。由此引伸，社会下层的聚义也可称为“义聚”^④。里巷官社在自愿基础上实行丧葬互助，自然也可称为“义聚”。吐蕃时期敦煌儒风坊西巷社社条开头规定的立社宗旨：“所置义聚，备凝凶祸，相共助诚（成），益期 济急难”，亦即“结义相和， 济急难，用防凶变”之意，与公共积累初不相涉^⑤。

四、社邑与寺院的关系

唐末五代宋初的敦煌，佛教盛行，佛寺很多，佛教成为多数人的信仰。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社邑，与佛寺大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绝大多数的社邑与佛寺的联系只是思想上（信仰上）的联系，但也有一些社邑，由于共同举办活动的需要，与寺院保持一定的经济联系。燃灯社、行像社即为此类社邑的典型。论者或认为：“在敦煌地区，大部分以经济和生活互助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寺院的控制，分别帮助寺院举行各种佛教活动”，“这类社和佛社一样，是寺院经济与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它们为地方僧官和寺院提供的物品和劳动力，都被无偿地占有了。所以，从实质上说，佛教僧团与其所控制的兼行佛教活动的社之间存在着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寺院通过与之有联系的私社几乎控制了敦煌的全体居民”，“寺院对兼行佛教活动的私社的控制与剥削，大大加重了私社成员特别是贫穷社人的负担”^⑥。笔者以为，凡此等等，都未免言过其实。敦煌以外地区，因缺乏定量的实证

^① 论者或谓：“一社之内，立三驮名目者死亡时，可享受远较三驮为丰的纳赠及隆重葬仪，而未立三驮名目的社人则只有厚赠助葬的义务而自身无请赠的资格”。其根据就是附表一C件。该件后缺，社众本身身亡赠例不详，按惯例应赠麦粟面油等，并送葬。该件规定，“社内三大（驮）者有死亡，赠肆尺祭盘一，布贰丈，借色布两疋半”，未言赠麦粟面油及送葬，赠物与仪礼显然不及社人本人身亡例。

^② 宁可：《述社邑》；郝春文：《敦煌私社的“义聚”》。

^③ 《宋史》卷456《孝友传》即载：陈旭宗族同居，宋太宗“以远民义聚，复能固廉节，为之叹息”。

^④ 《唐摭言·争解元》即载：“江西钟传令公起于义聚”。

^⑤ 上引儒风坊西巷社的“所置义聚”云云，虽非公共积累之意，但不等于说当时社邑都没有公共财产（或公共积累）。特别是以修窟、修佛堂等为宗旨的社邑，因其所需财物甚多，所以常在筹备过程贮财生息。

^⑥ 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资料，不敢妄论。敦煌则幸有许多寺院的入破历在，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先看每年正月十五燃灯活动中寺院的收支情况。现存敦煌寺院帐历中，完整记及燃灯活动收支情况的，首推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①。该件共 747 行，首尾完整。现将该寺长兴元年燃灯活动收支情况分列于下（间接用于燃灯活动的开支不计，括号内数字表示所在行，下同）：

表四、长兴元年净土寺燃灯活动收支情况表

净土寺从燃灯社收入	同年净土寺燃灯活动支出
麦 3 斗，“正月燃灯社入”（43）	麦 1 斗，“卧酒，正月十五日窟上燃灯顿定用”（178）
粟 3 斗，“正月燃灯社入”（106）	粟 2 斗，“正月十五日卧酒，窟上看和尚顿用”（251）
	油 3 升，“正月十五日夜燃灯用”（324）
	面 2.5 斗，“正月十五日上窟燃灯僧食用”（385）

以上都是直接用于燃灯活动的开支。长兴元年，净土寺从燃灯社仅收入麦粟 6 斗，而直接用于燃灯活动的支出却达 1.1 硕（1 升油折麦 2 斗^②，下同），收支相抵，净土寺多付出麦粟 5 斗。可以说，净土寺与燃灯社共同承担了燃灯活动的费用。

再看行像社与寺院的行像活动。现存敦煌寺院帐历中完整记及行像活动收支情况的只有 2 件，分列于下：

表五、同光二年（924）净土寺行像活动收支情况表

净土寺行像收入	同年净土寺行像支出
麦 3 斗，“二月八日沿佛散施入”（42）	粟 1.4 硕，“卧酒，二月八日侍佛人及众僧斋时用”（271）
粟 5 斗，“二月八日沿佛散施入”（124）	粟 6 斗，“侍佛人顿递用”（273）
豆 2 斗，“二月八日沿佛散施入”（198）	粟 3 斗，“侍佛人九日就韩苦家解劳用”（274）
	粟 4 斗，“二月七日与行像社沽酒用”（320）
	油 1 升，“二月八日造粥用”（326）
	油 2.5 升，“二月八日斋时看待佛及众僧等用”（327）
	油 1 升，“与耽（担）佛人用”（328）
	面 3 斗，“二月八日造粥解斋用”（361）
	面 6.5 斗，“八日斋时看待佛人及众僧食用”（362）
	面 3 斗，“与耽（担）佛人北门造顿用”（363）
小计：“二月八日沿佛散施入”共 1 硕	折合 5.36 硕

表六、长兴元年（930）净土寺行像活动收支情况表

净土寺行像活动收入	同年净土寺行像活动支出
麦 3 硕，“二月六日沿行像施入”（45）	粟 2.1 硕，“卧酒，二月八日斋时看行像社人及助佛人、众僧等用”（271）
粟 6.8 硕，“二月六日沿行像施入”（108）	粟 6 斗，“与擎佛人北门顿酤酒用”（204）
米 5 升，“行像社入”（130）	粟 1.2 硕，“二月七日与擎佛觅助佛人用”（205）
豆 2 斗，“二月六日沿行像施入”（138）	油 4 升 1 抄，“二月八日造粥斋时煮看社人、众僧用”（273）
	油 1 升，“与擎大佛人北门顿用”（274）
	油半抄，“九日收佛衣日炒用”（275）

^①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辑 369~389 页。

^②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辑 313 页《辰年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第 19~20 行即记：“油捌胜折麦壹硕陆斗”。

	面 1.2 硕，“二月八日造粥斋时胡饼、饧饼、看社人及擎小佛子兼众僧等食用”（334） 面 4 斗，“与擎佛人北门顿用”（336） 面 2 斗，“九日收佛衣众僧斋时用”（337） 布 15 尺，“造两个，行像新旧伞用”（427）
小计：10.55 硕	折合粮食约 6.7 硕，布 15 丈

上引两件净土寺入破历显示：净土寺每年从行像活动中收入甚微薄，多者 10 硕上下，少者仅 1~2 硕。直接用于行像的支出，都在 5 硕以上（还不含布折粮食）。其收入，绝大多数来自“沿行像散施入”。来自行像社者很少^①，或者完全没有。除行像、燃灯活动外，未见行像社、燃灯社为寺院提供劳力、财物的实例，亦未见其它社邑（佛社或互助社、里巷社）为寺院提供劳力、财物的实例。因而，完全说不上是“寺院经济与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和燃灯活动一样，行像社提供的人力与极其有限的财物，以及僧俗吏民的“沿行像散施入”，大体上也是直接用于行像活动，并未进入寺院经济的生产过程，或成为寺院僧尼的日常消费品。因而，我认为燃灯社、行像社为燃灯、行像活动的付出，乃属燃灯社众、行像社众的文化消费（宗教信仰上的消费）范畴，亦即与寺院共同举办燃灯、行像活动，谈不上是为寺院无偿提供财物、劳力。就燃灯、行像活动而言，寺院与燃灯社、行像社之间，并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寺院上层与部分僧俗吏民之间诚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而不是作为一种集体的“社”，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碓、油梁与放贷等活动，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

关于敦煌寺院通过私社控制敦煌居民问题，论者又作如下估算：上引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有“面一硕二斗，二月八日造粥斋时胡饼、饧饼、看社人及擎小佛子兼众僧等食用”项，假定一顿饭每人食用 8 合，一硕二斗即约为 150 人的食量。除净土寺僧、沙弥 20 余人外，在净土寺用饭的社人还有 130 人左右。净土寺只是敦煌小寺，其它大寺控制的社人可能更多。假如敦煌每寺所控制的社人在 150 人至 200 人之间，则 17 所寺院指导、控制的社人就有三四千，加上社人家属，总人口就在 15000 人以上，时敦煌人口仅 2 万左右，也就是说，寺院通过与之有联系的私社几乎控制了敦煌的全体居民。笔者以为，上述推算的各个环节都失之过宽。1、当时供食标准一般为日食 2 升。敦煌习俗是日二食，早料（上午）一般为面 1 升，午料（下午）多为胡饼 2 枚，也是 1 升，夜断^②。日三食者也有，但较少见。初春二月行像，日二食的可能性很大。粥斋时供胡饼、饧饼、，应即早料、午料两顿，亦即包含了全日食。以此计之，面 1.2 硕仅可供 60 人左右。2、时供食对象不限于净土寺僧人与社人，还包括“擎小佛子”人。“擎小佛子”人几何，不详，估计不下 10 人^③，再减去净土寺僧及沙弥 20 多人，则行像社社人不及 30 人^④。3、敦煌佛教僧团设有行像司、燃灯司，行像活动当即由行像司、燃灯司统一组织。现存敦煌资料仅见净土寺有行像活动，我们虽然不能据此断定当时只有净土一寺有行像活动，但也没有理由认定当时 17 寺都举行行像活动^⑤。如果不是 17 寺都举办行像活动，那么，当日在净土寺就食的僧人就不必限于净土寺 20 多位僧、沙弥。若此，参加行像活动的行像社社人就更少。4、

^① 笔者所见，最多的一次，是甲辰（944）后某年净土寺入破历算会稿（《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辑 455~509 页）第 491 行：“麦伍硕，行像社人入”，惜该算会稿被反面利用时，剪贴错乱，无法理清各年行像活动的总体收支情况。

^② 参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辑 278~280 页《庚辰~壬午年间归义军衙内油面破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辑 281~286 页《年代不详归义军衙内油面破历》。

^③ 该件支出项目就有一项是“粟壹硕贰斗，二月七日与擎佛觅助佛人用”，此壹硕贰斗之粟当为短雇之雇价。以每人每日雇价 1 斗计，壹硕贰斗可雇 12 人。

^④ 除行像社外，未见其它社以“社”的名义参加行像活动。

^⑤ 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辑 328~332 页录安国寺光启二年（886）诸色斛斗入破历，该寺当年就没有有关燃灯、行像活动的开支，由此可见该寺当年就没有举办燃灯、行像活动。

退一步说，即使是敦煌 17 寺都举办行像活动，那么，当时参加行像活动的“社人”，也不过 500 人上下。因为参加行像活动的不必一户一人，若以户计，充其量也不会超过四五百户。当然，这不包括观众与沿途散施之民众^①。总而言之，由净土寺长兴元年二月八日的一项供食记录，推论当时敦煌寺院“通过与之有联系的私社几乎控制了敦煌的全体居民”，未免失之草率。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此度稍作补充修改）

^① 观看行像活动与沿途散施的僧俗吏民都只是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社”的名义出现的。